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肖坤冰

[摘要]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关键词] 5·12汶川大地震;国族;族群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4-0021-04

“Nationality” and “Ethnicity” in Disasters

XIAO Kun-b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y a case analysis of the rescue work in May 12th Wenchuan Earthquake, illustrates the transitional rule of nationality and ethnicity in certain contexts, and explor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May 12th Wenchuan Earthquake; nationality; ethnicity

四 川的汶川、北川、茂县、青川等地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了 8 级大地震。此次地震发生的核心地带岷江河谷乃为多民族汇聚之地,三个少数民族——藏、羌、回族在此与汉族长期交融杂居。灾难发生后,党中央以最快的速度对灾区进行了紧急救援。在救援的初始阶段,小的族群边界被淡化,而更大的“国族”(或“中华民族”)被空前的激发和凸显出来。灾民中的任何一个族属都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然而随着救援进程的推进,“反结构”的社会逐渐复归正常的“结构”:在原本一片模糊的族群背景中,具体的民族属性开始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社会和媒体开始关注羌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而对另外两个民族——藏族、回族的相关报道则较少。

那么,灾难中的族群性何以某些被凸显,某些被忽略?各个不同的族群对此突发性天灾有何不同的情境性反应?地方性知识、族群关系、民族宗教习惯又是如何渗入到关于灾难的记忆中的?笔者试对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语境”进行分析,并对特殊族群的民族内部自救问题进行思考。

一、灾难的第一阶段: 被放大的“国族”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所有的人

类社会(或明显或暗地)都遵循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模式,第一种是由司法、政治和经济地位,职务、级别还有身份组成的“结构”。这一模式是由有彼此区别、有文化定义、有若干区间,并且常常有等级系统的体制化的位置所构成的社会常态。另一种则是非常态的“反结构”,在这一模式中原有的结构被打破,社会表现为没有彼此区别、同质的整体,而并不是被“划分”成级别和身份的“区间”。5·12地震的发生之于当地社会,正是特纳所分析的由“结构”向“反结构”的逆转。这一突如其来的天灾将原有的社会“结构”打破和撕裂,使当地呈现出一种非常态的“反结构”。在地震发生的当时以及随后紧接着的几天之内,就处于当地救援的“灾民”而言,事实上是处于一种由“结构”向“反结构”过渡的“阈限”(liminality)之中([英]维克多·特纳著,柳博斌,黄剑波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这种阈限是“从正常状态的社会行为模式之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和空间”,阈限或阈限人(“门槛之外的人”)之间世俗的级别之分和地位之分消失了或是被同化了,社会呈现出一种无地位(statelessness)的边缘状态。

个案 1:北川县的幸存者张某口述:张某,女,土家族,5·12地震的幸存者。2007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之后在北川县旅游局

慈善·
伦理·
人文关怀

肖坤冰
灾难中的
“国族”与
“族群”

工作。

我当时是3点开会,两点过在睡觉。整幢房子全部垮完了,前面是酒店,酒店全部沉下去了,只剩上面那个顶顶,那个房子有四五层楼高。唯独我住的那幢房子还没倒,我当时以为是挖地基,因为后面修一个广场。后来我觉得反正要死了,没的法就把衣服穿好,死嘛死的漂亮点。那个席梦思床从边边摇到中间,从中间摇到角角,推过去推过来的。电视也爆了,一倒下来就爆了。最后震完一看没死啊,把窗户打开,前面那个房子全部倒完了。

我赶紧抓个随身包跑下楼,看到街上死的哦,伤的哦,头破血流的啊,抱起喊哦哭哦。我们楼下的超市有个残疾人,平时都拄了拐杖,那一下拐杖没有拄了,对到我喊“张某快点过来啊,房子要倒了”,把我拉过来。我一看,咋不用拐杖了。他说不用拐杖了,这一下哪个还用拐杖哦。那时候人的潜力好大哦,平时都拄着拐杖走的,那时候哪还拄拐杖。我们就找娃娃嘛,往那边老县城走找娃娃。找娃娃的时候,那边过来的人说哪还有娃娃哦,死都死完了,老县城全部被埋了,都没有了。当时那个“北川酒店”还在塌,大家就往县委县政府跑,县政府前面有个空地。我们当时就在县政府,大家就喊背靠背坐起嘛,当时余震不断,摇过去摇过来,摇得很厉害。都是背靠背,认不到人,那时候恩怨情仇都没有了。生死面前,超越国界了,超越仇恨。因为地震,山一直在垮塌,昏天黑地的,都背靠背地把脑壳抱起。摇得很,一会摇过去一会摇过来,那时候已经没有生的希望了,都想快点死嘛,快点死嘛。心里头想石头快点滚下来嘛,打死算了。

下半夜的时候下起雨了,大家都抱成一团,余震不断,坐着都一会簸过去一会簸过来,大家都没的啥子安慰了,都想快点死嘛,快点死嘛。有的从汉旺镇过来的,家在北川的,说汉旺那边不怎么厉害。电话也打不通,有的说应该有人来救我们嘛,有的说万一一下不得来救呢,大家就议论嘛。反正没的什么生的希望了。等到快天亮的时候,宣传部长组织10个人一组,经过北川酒店,再经过老县城才到公路上去。喊快点冲嘛,10个人一组,往绵阳方向步行。当时他们都认为是北川遭了,其他没遭嘛。跑的时候,死的人也多。那时候也想不起老公了,也想不起小孩了,只晓得往外跑。搞不清楚是怎么跑过来的,反正是一堆堆的死人恰过来的。当时跑的时候10个人一组,因为要死嘛死的少点,那个崖头还在滚下来。我们当时一组跑出来几个都搞不清楚,只晓得往前面冲。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希望,反正就是往前面冲,踩着死人。开始还提个包包,后来包包也不晓得甩到那里去了,只拿了个手机出来。后来就

慢慢地走嘛,步行到绵阳安县。

从张某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地震中社会由“结构”向“反结构”的迅速逆转,性别、年龄、社会等级、族群边界等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统统消失,社会呈现出一种无序和颠倒的状态:平时拄拐杖的残疾人不仅甩掉拐杖,而且还招呼其他人逃离;当所有的幸存者都聚在县政府前的空地上背靠背坐在一起时,性别、年龄、社会等级、族群、宗教信仰等因素在常态社会中设立的“边界”彻底消失。在逃难的过程中,当张某穿着高跟鞋跨过倒塌的房屋和尸体,尽管其内在的心理体验可能比男性更脆弱,但在逃难中她只能体现出男性的性别特征“坚强”,而非女性的“柔弱”。也就是说在这一“反结构”的社会状态下,“女性”为“男性”所取代,或者表现为一种无性别;而她居然在混乱中忘掉了自己的小孩和老公,这更是一种“反结构”的典型体现。从她事后的悲恸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他们有很深的爱——一种常态表现。而她在叙述中特别提到了逃难过程中对老公和小孩子的短暂性失忆,则可能是源于心底深处的懊悔和自责。至于自己的族别,张某没有一点提及,也没有提到灾难发生时,各个不同的族群有何不同的表现。在笔者问及这点时,她回答到“那个时候哪有这些啊,大家都是一样的”。而在笔者访谈的另外几个报道人中,也表示地震中“没有民族之分,只想着怎么活命”。地震的发生,使人们从类别(即正常情况下文化空间里的状况和类别)的网状结构中躲避或逃逸出去。阈限中的灾民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标识,没有世俗衣物(这些衣物体现着级别或身份),在亲属体系中也并没有他们的位置。

在地震发生的最初几天里,族群边界被完全模糊掉,地震灾区只有地名,没有族名。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民族”的话,这就是被激发出来的“中华民族”。这一“国族”力量的彰显是通过两条相辅相成以至于的路径来实现的:一是从外部将外界救援群体的认同范围逐步缩小,最终浓缩到地震震中“汶川”这一点上。如救援中打出的“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汶川人”等口号;其次是以汶川为中心,将地震的波及范围向外逐步扩大,将灾区所受的伤痛扩大为整个“国族”的创伤,灾民不管其所属哪个民族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受此劫难。如频繁出现在媒体和人们口头的“多难兴邦”、“天佑中华”、“中华民族是摧不垮的民族”等。“邦”、“中华”、“中华民族”等用语以一种潜在的话语/权力的力量,使“国族”的认同暂时超越和取代了某一个具体的“族群”。一位到过青川回族自治县灾区的成都的士司机这样说道:“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们(回族穆斯林)手里的时候,他们都感谢得不得了。我说谢啥子谢呢,我

们都是一个民族，都是兄弟姐妹。是不是嘛？我们咋不是一个民族呢？我们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民族，往下分得细些才是藏族、彝族、蒙古族这些……但总的来说我们都是中华民族”。这可说是在地震发生的最初几天里所有普通百姓的共同感受。

二、羌族：情境中凸显出来的族群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救援行动的推行，“反结构”的社会开始向原有的“结构”过渡，羌族逐渐从原本一片模糊的族群背景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媒体报道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羌族”。首先我们来看看羌族是如何被凸显出来的：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再次来到北川县指挥救灾，并特别指出“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要保护好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即使县城迁建到新的地址，也要做好这种保护工作”。此后各大媒体纷纷登出《四川地震对羌族文化造成严重破坏》（“新华网”5月30日）、《遭地震毁灭性打击，羌族文化遗产急需抢救》（《北京晚报》6月2日）等诸如此类的评论，甚至连国外媒体也登出了《地震威胁古老的羌族文化》（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5月25日）。而更为明显的则是此次地震中的一位传奇人物彭州市女警察蒋敏在媒体报道中逐渐表现出来的“羌族”特征。蒋敏因为在地震中失去了10位亲人仍然坚守岗位，多次晕倒在救援现场而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在对蒋敏的前期报道中，出现最多的称谓就是“女警察蒋敏”，并没有特别体现其所属民族。而随着社会和媒体对羌族的日益关注，在最近的报道中“女警察蒋敏”逐渐演变为“伟大的羌族女人”。

我们可以将震后大略分为两个时间段——尽管这两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时间点，而是呈现出一种相互交融的渐进式过渡。第一阶段大约在震后的四五天之内，这期间社会仍然处于一种颠倒、无序、混乱的“反结构”状态。媒体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命奇迹”，国家对地震灾区的救援也是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上，救援行动中只有“国族”，没有“族群”。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奇迹”的消失，救援行动逐渐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期间的社会和媒体开始逐步回忆和试图恢复震前的灾区“结构”，救援行动演变为一场生动的社会戏剧展演。从医院到帐篷学校、从灾民临时安置点到救灾现场、从抗震指挥部到街头的募捐箱……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戏剧社会”。按照特纳的仪式理论的解释，这一期间的社会属于由“分离”向“聚合”过渡的后一阶段，“阈限”期一些不明显的社会文化特征逐渐趋于明显，族群

边界也渐渐显现出来。

三、藏族的记忆与回族的自救

地震的发生尽管对于“地方”而言，它所造成的伤亡、房屋毁损、财产损失等都是是一样的，然而由于各个族群不同的历史记忆、复杂的族群关系、独特的自然认知等因素，对于这一场同样的自然灾害，其“潜藏的记忆”却各不相同。让笔者感触颇深的是在采访阿坝师专的严老师时，由于其藏族的族群身份，使他不自觉地由地震联想到了前段时间的拉萨“3·14事件”。然而两次“灾难”带给严老师的心理感受和“灾难”记忆却是不同的，地震让他感到党和政府对藏族的关爱与其他任何族群都是一样的。从严老师的个人体验来看，这两次灾难带给他的记忆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在“3·14事件”中他的身体和财产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而在5·12地震中他家里的房屋倒塌，只带有随身行李成为“灾民”，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3·14比地震更可怕”。

其他几个藏族同胞谈到了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他们由于信藏传佛教，就按照藏传佛教的方式念经、念“南无阿弥陀佛”，向佛祖祷告。就在震后的这些天，还一直向佛祖祷告祈求平安。并且都表示由于地震的发生暂时没有去关心奥运会，现在等稍微安顿好后，又开始关心奥运会了。

回族的救援实际上是在这次地震中最值得关注的。由于地震的突发性和在救援第一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灾民身份的扁平化，致使国家在最初的救援行动中完全忽略掉族群边界，而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是来不及顾及到回族特殊的饮食禁忌。这种对所有族群一视同仁的统一救援造成了两个相伴而生的后果：一是在政府最开始组织的救援物资中，没有特别为回族准备清真食品，送到回族灾民手中的食品并不适用；二是与此相对应的，全国各地的穆斯林自发组织清真食品送往灾区。

此次地震的主要灾区汶川、茂县、映秀、北川、青川县都散居着回族，青川县就有多个回族乡和回族村。在地震发生的最初几天内，由于政府来不及调运专门的清真食品到灾区，穆斯林内部展开了积极的自救活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清真企业和穆斯林都主动为灾区穆斯林提供清真食品和物资，成都很多拉面馆的老板自发组织了清真食品开车运往灾区。由于最初几天到汶川、茂县的公路还未打通，政府的救援部队都很难进入，这些救援物资就主要运往了交通条件稍好的青川。

关于回族的救援，也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一是特殊族群的内部自救问题。此次地震灾难中穆斯林

群众所展现出的族群内部自救能力,既能最快地解决灾区穆斯林同胞的饮食问题,又减轻了国家负担。这不仅是穆斯林内部凝聚力的体现,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里互相体谅、互助互爱的体现。政府在震后的两三天后已着手组织专门的清真食品运往灾区,对死亡的回族同胞,也尊重其民族风俗将遗体交由阿訇处理,并且调用军车帮助省伊协运送清真食品。5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对安排好四川广元青川县回族群众生活,及时提供回族群众急需的清真食品等作出重要指示。5月29日的省伊斯兰教协会的相关发文中表明“地震初期亟需清真方便食品的现象已经根本改变”。二是就族群性的表现来看,回族在大众传媒中并不多见,外地的穆斯林一般是通过“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之光”这两个穆斯林网站了解灾区的情况,而非穆斯林则很少知道这两个网站。媒体对回族的淡化处理,既有如洪某提到的穆斯林做好事不愿被采访的因素,也和媒体只关注容易吸引眼球的羌族文化、救援英雄以及生命奇迹等社会“焦点”有关。三是族群、国族与跨国界的宗教认同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回族的

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其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而伊斯兰教是一个跨越种族、族群和国界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除了回族以外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许多族群也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尽管在这次地震中受灾的穆斯林只有回族,但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包括国外的沙特、伊朗等国也纷纷向回族伸出援助之手,基于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的宗教认同正是这次穆斯林内部自救的基础。然而这种跨族群、跨国界的宗教认同依然难以超越国族,正如洪某的表述“我是中国穆斯林,首先我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国族之下的宗教和族群认同。”

收稿日期 2008-06-10

[责任编辑 秦红增]

[责任校对 刘连芳]

[作者简介] 肖坤冰(1981~),女,四川资阳人,厦门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邮编:361005。

大明山天坪的来历

大明山主脉群峰之顶有八片天然大草坪,面积达180亩,四周古木环绕,中间长草不长树,人称天坪。大明山的天坪其来历什么样,到现在还没有人破解。其实,从大明山周围流传的神话故事,人们可以找到答案。

用古壮字记录的壮族师公经书中有民间神话故事《布伯的故事》(这个神话故事主要流传于广西红水河流域各县)。在《布伯的故事》中明确提到“岷赤山”,蓝鸿恩特地作了注明,说是壮族民间传说中最高的山。这里所说的“岷赤山”就是大明山的壮语音译“Byacw x”。《布伯的故事》梗概如下:相传管风雷雨电的雷王从天上来到人间,在享受布伯的宴请之后,提出天晴落雨归他管,种出的庄稼他要收租。雷王三年收租,无论芋头、稻谷或是苞谷都一样不得,一气之下回到天上,叫雷将陆盟不给人间送雨水。布伯让人去开天河,雷王把天升高,只留“岷赤山”上的日月树作为天梯,不给开;布伯去向雷王的兄弟龙王借水,龙王不借;布伯让人们七手八脚去拔龙须,龙王无奈只好放水。布伯磨剑,上“岷赤山”找到日月树上天找雷王,碰上雷将陆盟正督促雷兵补天河,糊天池,布伯把陆盟推下天河,追到雷王殿里,把雷王拉下殿来,用剑逼着雷王降雨。雷王磕头求饶,答应三天后降雨。布伯走后,雷王反悔,叫陆盟砍断日月树,磨利板斧。雷兵契高知道雷王反了心,下人间告诉布伯。结果雷王被擒,布伯将其关进谷仓。雷王装鬼脸逗引伏依兄妹,骗取蓝靛水喝,全身力气顿增,挣烂谷仓出来,拔颗牙齿送伏依兄妹,腾风驾火回天而去。伏依兄妹种牙齿,结葫芦,钻进躲雨,布伯以撑开的伞倒置成船,在洪水里漂浮,乘伞船向天门驶去,提剑直奔雷王,将其脚削断了。雷王、龙王忙令退水,洪水退得过猛,将布伯伞船摔到一块大石头上,把布伯和伞船摔得稀烂。布伯的心进到天篷上,成了启明星。洪水退后,伏依兄妹在金龟、竹子的撮合下,听取其父布伯启明星的劝告,在两个山头各自点燃一堆烟火,两堆烟升上天合拢在一起就结婚。婚后生下肉团,用刀切碎撒下山,变成了许多人。可见,《布伯的故事》说明大明山上原本有日月树作大支柱撑着天空,后来,人间英雄布伯与天上的雷王争斗,雷王发威天下大旱,布伯顺着“岷赤山”上的顶天柱爬上天去大闹王宫,雷王大怒,挥剑砍断了“岷赤山”上的顶天柱,这项天柱一倒,便造成了地陷东南,水向东流的局面。雷王砍顶天柱的地方,具体就在大明山上的三天坪。如今其方圆几里不长树,都是一片大草坪。可见,大明山天坪的来历与雷王和布伯的故事是有关的。民间相传此处曾有天坪仙圩,鬼灵神仙多居住在那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鬼灵神仙们便下山四处游荡,而长年与鬼灵神仙居住在一起的便是一些蟾蜍,即癞蛤蟆,壮语叫“苟收”,据说是天柱崩塌时从天上掉下来的灵物,为雷王的使者……

迷人的神话传说说明大明山是百越民间传说中最高的山,是壮族的祖宗神山,具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作者简介:黄世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广西南宁,530006)